當代香港性教育論述

周華山

在偶爾的情況下，筆者看到教育署一份為中學教師而設計的性教育教材指引，從而引起許多反思。帶著濃厚女性主義和同志研究的背景，筆者深感有需要反思本地性教育教材所蘊含的種種意識形態，基於資料收集的困難，本文只討論文字媒介集中在政府（教育署）及自願機構出版的性教育教材與調查報告。香港家庭計畫指導會是眾多自願機構裡最熱心與努力於性教育工作的，一直以來成績斐然，故為本文的重要討論對象；其他還包括青年協會、突破等機構在性教育上的文字出版。

本文只針對文字出版，既不處理教師、社工及有關人士在性教育過程中與受眾的實際互動過程，也不探討錄像、幻燈等非文字媒介上的性教育，而且侷限於政府與志願機構，對個別學者或人上的作品一概不論。

翻開本地性教育教材感覺大多強調「客觀」、「正確」、「開明」的性教育及拒絕主觀武斷的道德判斷、避免錯誤性知識／觀念、反對把性當作禁忌。家計會在《性教育家長手冊》（1992）裡就表示：「現今的年輕人需要的是正確的性知識，和合情合理的性價值觀念，好讓他們能安然處理自己的性行為。……父母要明白談『性』或不談『性』，都不能防止孩子產生性好奇，但不談性的後果，反助長他們採取不正當的途徑，來滿足他們的性需要和性好奇，而談性的好

處卻可以防止它們從事不負責任的性活動。總之，自我充實了正確的性知識，才足以糾正訛傳誤說」（1986: 5-6, 9-10）。

「性」從壓制轉化為公開的論述對象，並不意味著真正的性解放；「性」的論述無疑是較前開放與普及，然而「性」卻被輕化為科學的論述對象。現在權力運作不再只是通過武力鎮壓或禁忌制約，而是把人們納於無微不至的（科學）知識／權力網路中，美其言把人建構為「正常」、「健康」、「理性」、「自由」的獨立個體，實則把一切「性」活動與觀念屈服於「性的科學」（*scientia sexualis*）的精微控制裡。從此，現代人不用禁制壓抑一己的性慾，而是夸父追日汲求專家界定的「正常」活動，稍一差池就被界定為「不正常」、「失調」、「病態」、「壓抑」，而需要接受專家的「教導」；可是治療的過程卻進一步鞏固「知識／權力」對身體的掠控，踏進治療的論述過程，我們立即成為無助的病人，必須主動地把自己的病向社工、醫生、性學家、心理分析者談說（懺悔）出來，然後等待一個「他者」（專家）替自己診斷、詮釋、與治療。君不見，現代人主動自我傾吐，企求專家的診斷，甘願自投於風紀社會的權力網路論述裡，以恢復「正常」、「健康」的「主體」人格。

綜觀香港本地性教育的文字出版，就發現並不如出版者所期望般「客觀」、「正確」與「開明」：

（一）異性愛中心

香港的性教育工作，向來是「異性愛」性教育工作，若非絕口不提同性愛與雙性愛，就視之為違反自然的異常。受教育的中學生與青

少年先驗地被假定是異性愛者，所謂「情」、「愛」、「性」部是以異性愛者觀念為設計。家計會在 1992 年再版的《性教育——家長手冊》中，特別增設一章去「闡釋」與性有關常用的各種辭彙（1992: 107），包括：

性交：性交是男女示愛的最親密方式，一般是指男性將陰莖放入女性陰道內的行為。

約會：一對男女單對單的相聚，作為普通社交的方式或戀愛的形式。

戀愛：一對男女彼此愛慕，想增進了解並建立長遠關係的一種交往行為。

婚姻：男女間的結合，經雙方同意，公開及法律上就可的一種關係。（1992: 112, 110）

換言之，約會、戀愛與性交，並非同志的權力，只是異性愛者的特權專利。在教育署出版的性教育資料裡，「同性愛」或「雙性愛」一詞並不存在，通常在預防愛滋的標題下才出現。至於向來開明進取的家計會也只是偶爾提及。1991 年 12 月出版的《性教育行動綱領上篇》，是為校長與教師「在校內推行性教育提供一些具體建議」（91: 3），其中有同性戀行為的個案（20 頁）指出「兩名中三學生小惠和小梅有同性戀傾向，前者扮演男孩子，常親吻及擁抱後者」。但親吻及擁抱表示愛戀的自然行為，為何也分男性化及女性化？為何主動的就被界定為「扮演男孩子」？女子不可以主動嗎？主動就是扮男子嗎？為何我們總是以男尊女卑的異性愛思維來閱讀同性戀及所有女男關係，總是將同志設計定位成一男一女？

文章在「處理方法」裡，稱小惠小梅有「不尋常行為」，還給了校長一些考慮要點：「青少年可能會因為生活圈子狹隘，而對少數同性朋友產生感情上的依賴，可提醒教師及家長不須過分憂慮」，「提醒學生，同性間出現親密的身體接觸——在心智發展未成熟之前，應加以制止」。

青少年階段的同性愛被說成是「生活圈子狹隘」及「心智發展未成熟」的表現，但為何一對異性愛者卻不須以同樣理由而「加以制止」？大部分的研究都發現，同志大多在青少年期間，已清晰確定自身的同性愛情欲取向；如斯自然而然的主體身分，為何要被說成是「病態」、「好奇」、「補償」或「階段性的過度」？「教師及家長不須過分憂慮」，只因當事人的生活圈狹隘才會喜歡同性；倘若當事人是真心獨取同性，家計會認為家長和教師就必須憂心忡忡嗎？

家計會出版的《性教育小冊》裡更有專題探索「同性戀的成因」，謂：「大部分的同性戀者是基於逃避異性的心理因素。還可能是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之中，與父母相處的關係或異性相交的經驗裡，對異性產生恐懼和不滿，而造成同性戀的傾向」（1986: 66）。

為什麼異性愛會被假定是先天和自然，同性愛卻一定有「病態」的社會「成因」？筆者接觸過上千個同志朋友，包括香港國內以及英美的，從未遇上「對異性產生恐懼和不滿，而造成同性戀的傾向」。倘若《性教育小冊》的作者在生活上平等和對等的與同志朋友接觸，大概不會寫出如斯無知及偏見的文字。

可喜的是，家計會近年在同志的課題上有很大的進步。1995年

底，家計會推出「中學性教育——聯席教學計畫」，透過教育幹事與老師或社工合作，協助學校推廣性教育。在「合辦形式的建議內容」的八個項目裡有「性取向」一項，「探討個人對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的態度，建立平等的價值觀」，還強調此項目「適合各級學生」。

能夠在性取向的課題上，推動民主精神，實在令人鼓舞。誠如 1995 年家計會編印的《家庭生活教育簡訊》（33 期）中一篇〈性取向與同性戀〉表示：「同性戀並非疾病或精神病，同性戀者更不是神經質、適應能力較差或變態。同性戀的心裡狀況可謂與常人無異。同性戀者可能不能夠從外表分辨出來。同性戀者也未必一定有變性的念頭，未必會喜歡穿異性服裝。大部分的男同性戀者都不一定是舉止柔弱的『女人型』，而女同性戀者也不一定是舉止粗豪的『男人婆』。在男同性戀行為中，較普遍的性行為並非肛交，而是接吻、擁抱、愛撫、互相自慰或口交等。在感覺和情感方面，同性戀者一樣有愛和被愛的需要，可以擁有真摯恆久的愛情，也講求責任和關懷。……然而，仍然有不少人對同性戀存有恐懼、偏見和仇視。事實上，我們的文化是建立在異性戀主義結構之上，一切皆以異性愛作為標準，視異性愛為健康和正常。社會人士都不自覺地強化異性愛的觀念，下意識地醜化或沈默對待同性戀。」

在性教育工作上，旗幟鮮明、貫徹始終批判同性愛的，非《突破》雜誌莫屬。突破是一個龐大的意識形態論述系統，包括電台節目、影音製作、輔導服務、書室、報章雜誌專欄、出版發行（逾百本書籍）等，影響力無遠弗屆。自 1974 年 1 月創刊以來，《突破》雜

誌一再強調：「同性戀是一種心裡上的偏差，也可以說是一種病態」（第 40 期）。「一個同性戀者.....有些心裡不平衡.....假如真的患有同性戀（病），年日越久，需要根治的日子也越長；正如其他病症一樣，如今早發覺哪裡出了毛病，醫治也會更快，更有把握」（第 40 期）。「同性戀者不願和異性建立正常的男女關係。這種心理狀況是不健康的.....如對異性發生厭惡的心理，對自己的性缺乏信心，或強烈的同性認同等等。總之，同性戀者基本上都是心理有偏差的人，在主動或被動的情況下，變成了這種情況，以致泥足深陷，不能自拔」（22 期 28 頁，35 期 29 頁）。

1991 年 1 月（194 期）的《突破》做了一個同性戀專輯，依舊從異性愛角度出發，複製主流社會對同性愛的偏見。作者在採訪女同志 Sue 的前言裡，只關心她是否「男人婆」：「未見如（Sue）之前，我只在電話中聽見她低沈圓渾的聲音，所以猜如必定很男性化。在餐廳見著了面，卻沒有這種感覺.....矮小的身材，只可說灑脫，談不上陽剛味.....採訪中有那麼一刻，侍應送來了餐牌，她翻開一看，裡邊掉了一隻小蟲出來，她頓時忽然嬌嗔，花容失色之態，在漫不經意中流露。」作者貌似打破「女同志皆是男人婆」的神話，但整個論述卻停留於「男人婆與否」的閱讀架構之中，先驗的把 Sue 箝制於異性愛論述系統裡，繼而建構扭曲的形象。作者還進一步把「同性愛」視為異性愛論述系統下的「性戀」奇觀，在前言裡強調：「採訪進行時，如（Sue）不忘四處張望，尋找哪兒有漂亮的女郎。」但，如果被採訪者是異性愛男性的話，任憑他誇張地凝視異性，作者也不做報導，更絕不會放在「前言」裡隆重其事？一旦是同志，就必定從性角

度上閱讀，試想，這種「同志皆濫交」的神話是誰創造出來的呢？

有關 Sue 的報導徹始徹尾是異性愛閱讀，從開始就強調她來自不美滿的家庭：「小時候母親管教很嚴，將我們關在家中，不准到外遊玩……我不喜歡爸爸，他很爛賭……我讀的是女校。」整個論述預設同時鞏固整個主流社會對同性戀的典型化標籤——仇視父親，母親管教過嚴，女校等出身。從問題的設計到作者的報導，是義無反顧的異性愛中心論，還故意選擇「我是那種 born with emptiness 的人」為標題。

《突破》向來堅持「積極向前」的人生觀。在以往數百篇訪問稿裡，即使當事者遭逢死人塌樓屋漏兼逢雨的人間慘劇，編輯也故意突出當事人百折不撓的積極奮鬥精神。唯獨對象是同性戀時，編輯卻「無微不至」地揭糞其陰暗面，因而在生產和鞏固「同志事件悲慘」的社會「常態」。

1995 年 7 月《突破》做了一個二十四頁的同性愛專輯（24 期），在「致讀者」的編輯人語氣，總編輯竟然叫同志「戒除同性戀行為」？出版總監吳思源撰文說：「同性戀作為一種性愛取向，本質上正是歪離了人的生理、心理，以至於性生活的自然定律……在性別身分和性愛生活上的缺憾。」（25 頁）總幹事蔡元雲更表示：「同性戀行為是一種沈溺性的行為」（28 頁）

1995 年底，香港政府就社會大眾對同性愛及雙性愛的看法進行問卷調查。這份問卷只有十二條問題，內容態度都是十分偏頗誤導的，其中內容包括：「你是否願意和同性戀／雙性戀者握手？」「你是否願意和他們唱卡拉 OK？」整個問卷設計已假定同性戀／雙性戀

者是變態、恐怖、極其侵犯性的異類怪客。其荒謬的程度猶如政府訪問社會大眾是否願意與女性或印度人握手／唱卡拉 OK？如此性別主義與種族沙文主義式的歧視，竟然在這個自認民主開放的香港政府裡發揚光大？

而且，問題不是一般男人／異性愛／非印度人是否願意與女性／印度人／同性戀握手，而是女性／印度人／同性戀是否有權力與其他人握手？問卷大部分的問題是：你是否介意與同性戀／雙性戀者「一起看電影在／同一辦公室工作／同讀一班／任職大學、中學教師？」難道看電影也要分性取向？難道求學與工作是異性愛者的專利嗎？問卷如斯設計，把同志求學、工作、看戲、握手、唱卡拉 OK……的基本人權，變成異性愛社會大發慈悲下的「恩賜」。倘若大部分異性愛市民表示不願與同志握手、看戲、唱卡拉 OK、工作……難道要立法禁止同志享有這些權利嗎？

這個向來自詡全力支持、推動性教育的香港政府，是否明白這份問卷做了多少誤導、歧視、偏頗的「性教育」呢？問卷美其名是客觀中立地調查市民對性取向的看法、內容設計卻充滿歧視和污辱性，自然得到預期異性愛中心的答案。

(二) 性別主義

性教育原意是幫助大眾反思及面對主流社會的性論述，從而建立健康和幸福的性主體，偏偏本地性教育往往對主尊性論述語焉不詳，複製並鞏固社會固有論述，其中男尊女卑的性別主義算是典型例子。

明愛家庭生活教育在 1993 年再版了一份《漫步婚姻路》，特別

針對準備結婚的新人。在「我是一個理想的伴侶嗎？」（28-29 頁）裡，丈夫與妻子要回答十條問題，丈夫要答：「你有沒有依時給妻子適當的家用，而不要求她時時向你解釋如何使用這些錢？」這當然假設丈夫是一家之主，家庭的經濟支柱，妻子是「用男人錢」的家庭主婦，發問本身就預設男性中心的性別秩序。對妻子的發問更精彩，包括：「（一）你是否對丈夫的事業及發展表示關心和協助？（二）對丈夫喜愛的娛樂，你會否培養興趣與他一起參與？（三）當丈夫疲倦、碰到不如意的事或鬧情緒時。你能否察言辨色，給予他適時的寧靜、鼓勵或安慰？還是仍然告訴他家中煩瑣事，增添他的苦惱？（四）你是否仍注意修飾外表，令自己保持相當的吸引力，令丈夫以有你為妻子感到驕傲？……（六）你是否願意花心思在庖製一頓好菜與丈夫一同享用？你煮的菜餚有否經常變換？（九）你有否把家裡打理完善，令丈夫辛勞工作回來，能享受到寧謐、溫馨的家居生活？」（29 頁）

原來，妻子的角色是「關心和協助丈夫的事業及發展」，必須「培養興趣參與丈夫喜愛的娛樂」，要「注意修飾外表，保持吸引力」，「花心思庖製一頓好菜」，要「經常變換菜餚」，要「把家庭打理完善，令丈夫辛勞工作回來」，好好享受妻子的照顧。

這份一共印製四千份的《漫步婚姻路》先驗地預設男主女客的父權秩序，把「妻子」箝制於「私人—家庭」範疇內，還原為「家庭主婦」，要女子在婚後放棄工作、事業及主體，凡事以丈夫為重，盡所能專心侍奉一主。女子在扮演這種犧牲者角色時，更要「不會凡事挑剔及指責，引致家無寧日」，要「戒除佔有慾，容許丈夫有自己

的時間、朋友和活動」，還「不在別人面前訴說丈夫的不是，積極地為丈夫樹立好形象」（30頁）。

教育署在《性態度與價值觀》裡，討論「男孩子和女孩子在行為上的差異」（資料單張 3C），包括「男孩子比較（女孩子）活躍及獨立」，「女孩子沒有（男孩子）那樣活力充沛」；男孩子「比較有攻擊性」，而學業成績上，「在中學會進步」，女孩子「較少攻擊性」，而「在小學及初中時成績略為好」。這篇文章完全漠視主流社會如何把女男放置在不同的性別教化，把男強女弱、異性愛、父權論述視之為女男生理本質上的必然差異，竭力再生產固有的性別主義。

試想，嬰孩自出娘胎就接受性別主義味道濃郁的教育：教科書刊登的家庭圖片是丈夫辛勞工作返家後，倦極躺在沙發上看報紙，太太端出鮮美菜餚；童話讀本是純情善良白雪公主在小樹林迷路，幸好堅強勇敢白馬王子及時出現，拯救了她；男孩在廣大的戶外「公眾空間」裡四處跑跳玩球，拚個你死我活、成王敗寇、鬥爭到底，女孩不容隨便在戶外競爭活動，被逼接受父母親友贈送的洋娃娃、煮飯仔，遊戲日的是把洋娃娃（女孩）打扮成端莊賢淑、美麗動人的可人兒，正如煮飯仔遊戲的社會意義是內化「家庭主婦」和「好媽媽」的神話。至於中學學業成績的差異，更牽涉父母、老師對男與女在事業、成績、家務等不同期望與要求。上述文章漠視如斯複雜的「性別建構過程」（Social construction / processing of gender），把主流社會的性別偏見，簡化為女男本質差異。

在「價值觀念連續線」（作業 3.7）一節裡，文章表示：

「1.很多做丈夫的都需要與妻子分擔家務。因為現在越來越多婦

女同時是職業婦女及母親……。3.若配偶並無工作，丈夫應該是家庭的生活支柱。但是，如家庭有需要的話，婦女亦應工作幫補家計。」換言之，家務是妻子／母親的本分，若她是職業婦女，丈夫才需要「分擔」家務。賺錢養家是男人的天職，若家庭有需要，妻子才需要工作「幫補」家計，即是說明丈夫做家務，妻子賺錢，均只是「輔助」性質。

「4.一般來說，男性哭泣（尤其在公眾場所）並不是一種被接納的社交行為。但是，一個人不應壓抑他的情緒至超越人性尊嚴的程度。」文章把男性哭泣「問題化」而隻字不提女性哭泣，顯示女性哭泣是自然、正常、不值一提的平常事，男性則不應哭泣。

「6.在先進的醫學發展下，男性應該參與避孕，尤其是當他們的妻子的身體並不適合避孕時。」即是說，避孕是妻子的責任，只有她身體不適合，或先進醫學發展下，男性才應該參與避孕。

「7.問：男人比女人能作更好的決定？答：男性可能在他們認識得較深的事情上做出較好的決定，例如：經濟方面。……10.一般來說，政治及經濟並不是女性在晚宴中的主要話題。但是，女性在適當的場合中及適當的人物面前把自己在這方面的意見表達出來，也是無可厚非的。」

在「男性與女性在心理上的差異」（作業 3.9）一節中，要求教師／同學填寫甲與乙的性別：

「甲：我不明白為何我要在表格上填寫我的年齡。」

「乙：我只填上 A 字來代表成人。」

教育署給予的答案：甲是男，乙是女，因為「女性對自己的年齡

比較敏感和守秘」。

「甲：噢！這是一新的型號，我一定要看看！」

「乙：我就不感興趣了，我最不喜歡操作新的機器。」

答案是：甲是男，乙是女，因為「男性對新發明比女性更有好奇心。」

這是教育署給予中學教師的性教育教材，卻不斷複製主流社會的性別偏見，性「教育」只不過是再生產固有意識形態的過程。

突破機構在 1984 年出版了《本港青少年性角色、態度、行為研究報告》，強調「是次研究為一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目的是更具體地了解青少年的性態度……由於本研究主要為一描述的研究……，沒有援引任何理論支持一些觀念。我們基本上亦無建立什麼因果性的假設」（1994: 3, 5）。

開宗明義：客觀中立的描述式研究，沒有理論前設，沒有價值判斷，以示不偏不倚。奇怪的是，它卻先驗地假設「色情傳媒與其性態度和行為，有一定程度的相關」（6 頁）。

在「年青人對一般年輕男性的看法」一節裡，大部分被訪者認為年輕男性「頗為或十分注意儀容」，在「年青人對一般年輕女性的看法」裡，78.1% 及 81.1% 被訪者認為年輕女性頗為／十分「富思考能力」及「積極進取」。但這份報告卻強加了一個相當性別歧視的「描述」：「注意儀容」，還有性情溫和、細心、含蓄、善解人意、富同情心，被說成是「女性化性格特徵」（15 頁），「富思考能力」和「積極進取」（還有靠自己、有主見、個性緊張、決斷）被說成是男性化性格」（19 頁）。

男性「注意儀容」有什麼問題呢？男性不應「注意儀容」嗎？為何要被歸類為「女性化」呢？為何女性化就是注意儀容，而把富思考能力和積極進取說成是男性化性格？如斯父權本位的性別歧視，又是怎樣「客觀中立」的「描述性」報告呢？

在「男性及女性對自己的看法」裡，90.3%男性認為自己是頗為、十分或極度注意儀容，83.7%及 89.7%女性分別認為自己是（頗為、十分或極度）富思考能力，及（頗為、十分或極度）積極進取。這份研究報告的描述卻非常一廂情願地說：單憑注意儀容一點，就說「男性受訪者……覺得自己也擁有女性化的性格」，「年輕女性眼中的自己……包括男性化的性格。」（27 頁）。

問題是，男性被訪者根本沒有表示自己擁有女性化性格，沒有認為「注意儀容」是女性化性格；女性被訪者也沒有認為「富思考能力」或「積極進取」是男性化性格。被訪者可能視之為很「人性」或「自我」的自然特質，沒有必要把「思考能力」或「積極進取」性別化而變成男性專利。這份報告卻從「男堅強 vs. 女溫柔」的父權角度，把原來頗富女性主義元素的資料，變成鞏固父權架構的「描述性」文字。

性別主義不單充斥於女男性別角色的論述上，在性的定義上也表露無遺。

家計會在 1988 年出版的《性與健康研究會報告》裡，有一個非常男性中心的問答對話：問的是「長期性興奮是否是一件不好的事？」答案卻完全當女性不存在，女性不會有性興奮：「當男士達到性高潮後，便會有射精現象。此後，陰莖便會鬆軟下來，待休息後，

才再能勃起」(25頁)。

家計會在《性教育家長手冊》(1992)裡,「附錄一」是「針對家長協助子女處理性的疑問」(91頁),其中一條問題是:「有些男孩子,見到女生,性器官就會勃起,這個情況,是否有方法控制呢?」(97頁)發問本身就把某些男子等同為性慾機械,但凡「見到女性,性器官就會勃起」,那男子豈不是除睡覺以外,絕大部份時間都處於亢奮的勃起狀態?家計會的回答沒有處理這種把男人等同為性動物的父權假設,反而強化這種「男需要性 vs. 女需要愛」、「男性性慾是一觸即發 vs. 女性性慾是纖柔細緻」的二元對立,說「男孩子對異性開始發生興趣,有時甚至幻想與異性有親密的接觸,因此而產生性衝動,自然地使體內的陰莖勃起,這都是自然而正常的生理現象」(99頁)。

再看「附錄二」是有關性辭彙的定義,「性冷感」一詞的闡釋裡,竟然純粹指「女性對性交不感興趣,或有恐懼感」(111頁),男性必須性慾澎湃才正常,不可能是「性冷感」。「性無能」一詞卻陽具中心地單指「男性的陰莖不能勃起」,彷彿是說:女性不會性無能,因為沒有陽具。

最後,家計會《性教育小冊》第六章是「約會與婚前性行為」。在論及約會的意義時,文章說:「約會的目的除了交友,還可提高個人在友儕間的地位。一個男孩子能否約得一個女孩子為伴,一個女孩子又是否能獲得男孩子的邀請,是青少年衡量自己在友群中受歡迎的指標。接連遭受拒絕的男孩子可能失去自信,而從未受到邀請的女孩子亦可能產生自卑。由此可見,約會是提供男女相處正當

途徑，且又能滿足男女的心理需要」（42~43頁）。

性教育竟然把男描寫為獵人，女等同獵物，然後教導男女欲拒還迎，各取所需以保「自信」和「自尊」。想想，實在教人不寒而慄。

（三）西方中產婚姻霸權

翻看政府與自願機構的性教育手冊，會發現「婚前性行為」是極被關注的問題，通常與「性濫交」連在一起；當事人更會被賦予「混亂惶恐」、「不知所措」、「罪咎不安」等負面描述。

家計會的《「性教育」行動綱領下篇》首兩個案例，都是關於婚前性行為。當事人被形容為「自我形象低落」（1992: 19），在上篇的婚前性行為個案裡，當事人被說成是「非常徬徨」（1992: 21）。家計會的《性教育小冊》在「婚前性關係」之後便討論「濫交」，謂「不少男女，一時衝動，受不住情慾的引誘而意亂情迷。由於事出突然，心理上亦沒有準備，因此將來後悔的可能性會很大，還可能導致女方懷孕」（1986: 48）。婚前性事被形容為「一時衝動」的「意亂情迷」。教育署的《性態度與價值觀》更謂：「事實上，大多數的人在婚前都不是性活躍的。婚前性行為只會招致別人的輕蔑」（作業3.19）。

這顯然與事實不符：（一）家計會在1991年的調查發現，53%男性及42%女性在十九歲或以前已經發生性關係，到廿四歲，比率更高達84%及81%，可見大部分人在婚前頗算性活躍。（二）許多前線社工表示，越來越多青少年是自然而然地享受性事，沒有什麼罪咎或惶恐，只是有點擔心懷孕而已。

為什麼婚前性事總被賦予負面意義，淪為一被責斥的對象？為什麼我們只有「婚前」與「婚外」性行為，而從不認為婚內性行為有問題呢？

若我們並不假設每個人必須結婚，必要在婚內才可以有性行為，也沒假設婚後的性事必然較婚前性事來得自然美麗，那就全沒有理由以「婚姻」作為衡量性行為的最高原則，而把婚前性事統統貶為「濫交洩欲」、「一時衝動」、「混亂惶恐」、「受人輕蔑」。

教育署《性態度與價值觀》表示，「愛→婚姻→性」這個次序是最被社會人士接受的（作業 3.15）。香港青年協會在「少女懷孕現象」（1995）裡再三強調，傳統道德觀念是先有愛，再有婚姻，後有性。

錯！傳統中國社會，婚姻完全是家族間的事，一切由長輩作主，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床上性事亦為著家族繼後香燈，非為個人享樂，故曰「周公之禮」而非「造愛」。往往在洞房花燭之夜才認識伴侶，婚姻的基礎又怎會是愛？男家娶妻求淑女，強調的是家庭功能，最重要是好生養，夫婦感情好壞毫不相干。若沒有男丁，夫婦感情再好，妻子仍受千夫所指，大抵丈夫會納妾也說不遠。婚姻意義在於傳宗接代，大家不期望什麼轟烈愛情，反而夫妻感情太親密會阻礙家族人倫姻親關係，會被批評為忽略翁姑。夫妻常以兄妹相稱，正因為是兄妹關係多於戀人。

古人智慧飽滿，杜絕難以把持的自由戀愛，倡導兒童婚姻，一切父母作主，門當戶對，先結婚，後認識，禁制男女隨意接觸，是以古代婚姻異常穩定。說來諷刺，沒有愛情的婚姻最為穩定，離婚率極

低，傳統中國社會便締造出歷史上最穩定的婚姻制度，反而堅持有愛情的婚姻最為「危險」，離婚率極高。離婚率高，婚前與婚外性事普遍，並非道學士以為什麼「新一代有性無愛，只求剎那歡愉」。性濫交者總會「作繭自縛」而結婚呢！現代人重視感情，故濃情輕淡，不忍勉強繼續，寧願割捨而分離；一切以愛情為本，不再束縛在婚姻架構，故婚前性事普遍。研究顯示，懷孕少女並非什麼有性無愛的濫交者，更不是學業劣拙的破碎家庭產品，相反，她們「來自各階層的家庭背景，絕大部分與父母同住.....父母關係良好或普通.....少女本身與家庭關係多數自稱良好、普通.....學業成績以中等為主」（香港青年協會，1995：130）。家計會在 1991 年的調查又發現，在 1159 位被訪者裡，絕大部分（86%）第一性關係都是在情愛深濃的認真關係下發生，隨便發生關係的甚少，與性伴侶是以感情為主的愛情關係。

「先愛，後婚姻／性」，並非傳統道德觀，而是民國初年才由胡適、魯迅等人倡導的新秩序，主張一夫一妻制，在 1971 年才被香港法制肯定，取締了中國傳統一夫多妻納妾制。這套「破壞」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西洋中產階級一夫一妻浪漫愛情觀，卻被香港道學之士絕對化為唯一真理，甚至被誤作傳統道德。

如今，婚姻被視為感情關係的中心。我們把感情劃分為許多個階段：如邂逅、普通朋友、拍拖、戀愛、同居、結婚等。婚前性事、婚外情、離婚、不婚、未婚媽媽.....之所以受批評，只因我們以婚姻為絕對標準，一切偏離婚姻這個軸心的愛情和性事，就被批評為濫交、不負責任、不尊重愛情、不成熟等。

主流性教育把婚前性事視為「嚴重問題」，關心的不是性行為的內涵及彼此關係的素質，而是行為主義地關心性行為是否在婚內發生。更惡劣的「婚後性」也不被非議，更優秀的「婚前性」也備受非議。離婚不見得比苟延殘喘的婚姻更痛苦，即使離婚後雙方變得輕鬆、愉快、幸福，我們仍視離婚者為失敗者，其中女性承受的社會壓力尤為巨大。香港明愛家庭服務與香港大學社工及社會行政系合作的《婚外情問題研究報告書》（1995），便是一夫一妻婚姻霸權的典範。研究發現五分之一夫婦在感情良好下出現「婚外情」，可見多元關係不是件壞事，所謂「第三者」不一定是一種威脅，離婚也不必然是呼天搶地的慘絕人寰。但《研究報告書》預設一夫一妻婚姻制的絕對性，因而建構出「婚外情」這個「問題」，視之為對既有關係的威脅，結果自然是千方百計杜絕婚外的關係。

婚姻成為衡量感情成敗的標準；願意結婚便是有「誠意」，結了婚便是「幸福」。婚前性事被視作濫交、不負責任，只因發生在婚姻之外。同樣的行為，到婚姻註冊簽名後，便忽然變成「自然」、「正常」。婚內性生活惡劣差勁、婚內強姦、家庭暴力，旁人不會過問，警方也視為夫婦私事。婚前性事神采飛揚，閒言閒語也四方讚來，標準依歸當然是「婚姻本位」。

婚內強姦、家庭暴力、夫婦權力不均的支配與剝削，成為本地性教育的結構式盲點，從來不與探索甚至提及。社會調查也循例集中婚前或婚外的性行為，還總必加以醜化及貶斥，令當事人感到「徬徨」、「罪咎」與「不安」。此等徬徨、罪咎與不安，並非婚外性事的內在本質，只不過是婚姻本位性教育的後遺症。

(四) 年齡主義

本地性教育常常把「性問題」翻譯為「青少年性困擾」，先驗地把青少年的性需要「問題化」，同時亦預設並鞏固「成年人 vs. 青少年」主客對立、權力不均的操控與支配。

我們只有「青少年（性）問題」。「成年人（性）問題」這個辭彙根本不存在，原因當然不是因為成年人沒有性困擾，而是成年人擁有界定別人問題的社會權力，因而出現對人和對己在（性）生活空間與行為準則上截然不同的雙重標準。正如在性別主義的語言中，只有娼妓問題（沒有嫖妓問題），只有女性解放運動（男性不認為自己需要解放），只有同性愛的成因（從沒有人研究異性愛的成因）。

本地性教育工作基本上由一群「西化—中產—大學畢業—異性愛—成年人」負責。這群人普遍接納一套西方資本主義中產階級性愛觀為理想典範，也就是「異性愛浪漫愛情一夫一妻終身婚姻制」。異性愛一夫一妻婚姻是人生必經階段，以浪漫愛情為基礎，並必須依從下列程序：首先是自由戀愛，然後結為夫婦，最後才發生關係。性必須發生在婚姻內才算「正常」，青少年的性生活因為在婚前或婚外，均受道德譴責，被醜化為「濫交」、「淫蕩」、「自私」。

這套「愛—婚姻—性」的性論述本是西方十九世紀末工業資本主義的產品，滿足新生代城市人對自由戀愛的要求，同時捍衛中產清教徒重視工作綱紀的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沈湎性事只會破壞工作綱紀，必須拖延青少年的（性）快感滿足，把婚內性事

變成努力讀書、勤奮工作以至事業有成後的獎賞。性，遂被納入婚姻私人範疇，變成成年人的特權，青少年的性事便成眾矢之的。

在年齡主義的論述裡，但凡青少年間風靡一時的流行玩意，譬如過往少年在香港先後興起的娛樂與音樂、的士高舞蹈、電子遊戲機中心、桌球、色情刊物、漫畫、網路等，總之是青少年的喜好、服飾、語言、玩意，特別牽涉到性生活的，必定被成年世界痛斥為「放蕩形骸」、「荼毒心靈」。箇中的雙重標準昭然若揭：青少年的所謂「放蕩」，放諸成年人的大千世界，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滄海一粟——成年男人看 *Playboy*、*Penthouse* 是中產美學身分品味的象徵，青少年看三級漫畫卻是猥瑣庸俗的道德淪亡；名流哥兒富商公然在婚外嫖妓、包二三四奶、玩女明星，是（男性）社會羨慕忌妒的豪門韻事，青少年談戀愛發生關係，卻被貶斥為白甘墮落的不要臉。

事業有成的中產男人在性愛與道德上享有寬闊的社會特權，還處處定下法律與道德規則來限制青少年的活動，美其名曰對青少年的關懷與教育「都是為你好」，其實是要青少年依從成年世界所建構的社會秩序。此等年齡主義的語言，背後是男性中心的階級壓制與道德偽善。

踏進 1990 年代，這種要求青少年迴避性事、延遲性事的主流論述已經沒法對應當代青少年的實際處境。隨著社會變革，飲食與衛生條件的改善，青少年的發育年齡不斷提早，家計會在 1991 年的調查發現，少女平均在 12.4 歲出現月經初潮，少男平均 13.6 歲首次射精。到今日，發育年齡必定更早，但結婚年齡卻因著大專教育普及化、核心式家庭所要求的經濟基礎、新居房子的昂貴價格及社會價值

觀的轉變而不斷延遲。現時的成婚年齡中位是廿七、八歲，青年人即使要結婚，也有十五、六年過著有性需要而又未婚的生活，這尚未包括越來越多選擇單身，或二十歲前不考慮結婚的中產新生代。

從前想享受性愛就得進入婚姻建制，獨身是客觀條件差勁的無奈慨歎。今天，獨身卻是中產新生代的蓄意選擇。獨身者絕非性情古怪孤僻或什麼情場玩家，相反，大多是溫文敦厚、知書識禮、成熟獨立，只不過深明美好婚姻不易得，不願倉促成婚。這並非事業型男士的專美，女性對婚姻尤為恐懼。新一代女性經濟獨立，大專畢業後全力建立事業，深明男子自私自利的風流放蕩，更受不了大男人殘餘桎梏，提起生女育兒和家庭主婦角色便矮了半截，遂堅持不靠男人生活。又或者目睹好友拍拖六年，婚後三天便嚷離婚，女子遂患上婚姻恐懼症，女性朋友人同此心，三兩知心相伴相助，不愁寂寞，到思想與性情漸趨成熟，工作事業路向清晰，經濟穩定，與情人伴侶樂也融融，。萬事俱備，如今的問題卻是：為何要結婚？

問題是，主流性教育所建構有關「婚前性行為」的論述仍然假定每個人必然結婚，又醜化與否定婚前的性事。否定青年的性需要與（性）主體身分，徒然叫年青人每天抑壓那麼自然而實在的性需求，枯等那不知會否來臨的婚姻，同時又平添年青人在性生活裡的罪咎與不安。

家計會 1991 年的調查，訪問了 1159 位 18~27 的年輕人，發覺 53% 男性及 42% 女性在十九歲之前已有性行為，第一次拍拖的平均年齡為 13 及 17 歲。香港青年協會在 1995 年做的調查也發現，大部分被訪者第一次的拍拖經驗，都是在十六歲之前。

這委實是絕頂荒謬反諷的鴻溝：上焉者家長教師性教育工作者力竭聲嘶全面封殺婚前性事，下焉者青少年在諸般禁忌與封殺下仍享受多元豐富的感情與性事。其實，青少年從不如我們幻想中純潔，也不是道德家長害怕的敗類。只不過我們一廂情願把青少年純真化、孩童化，視做天使白鴿純善完璧，同時又義憤填胸的撥亂反正，把她／他們從「想像」的罪惡邊緣拯救出來。

現今香港青少年哪比其他時期的人來得敗壞？只要放下成見睜開雙眼，到處都是精乖聰明但感情脆弱的普通人。個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奉公守法。因著中五會考、大學入學試及各種公開考試，大部分青少年已耗盡精力而筋疲力竭，未老早衰，爭逞強而經不起考驗，反應敏捷但缺乏修養，急功近利而不講質素。在呵護姑息與無微不至的照料下，這邊廂充斥著大群志大才疏、功利實際、平庸安分的年輕人，那邊廂性教育工作者仍在慨歎青少年道德淪亡、沈湎性事，實叫人啼笑皆非。

罪魁禍首正是我們成年人。教育制度假借科學精神與實用主義名號，加上屠殺心思的校長霸權與家長主義，從然教導出貌似精乖醒目，實則追趕千人一面潮流文化的公式產物。中學教育界，從課程內容、教室管理、學校行政，以至層層下壓的考試制度，都以一套中產階級文憑主義為軸心，滲透著倡議競爭心理、延遲享樂、個人主義的功利實用原則；因而再生產社會既有結構，低下階層同學難以適應學校考試遊戲而被淘汰鞏固中產領導班子。校長與教師既未受過專業的管理訓練，雇用條件只著重學歷而輕視個人修養；這批人卻被要求充當道德教化的代言人，只懂依賴一套嚴格校規及科層式權利架構以求

有效控制學生，令學生成為校內最無權力、最受壓逼的一群。面對著權力高度不均的學校建構以及不合理的校規與處罰，同學往往有冤沒路訴，無力感強烈。學校變成最單調、沈悶、壓力重大的囚室，主體個性統統被剝奪。

相反，青少年喜歡的讀物，從三級漫畫到“**Yes**”等消閒讀物，卻處處肯定青少年的主體身份，活潑趣味地介紹豐富多元的性知識，幫助青少年處理感情與性困擾，不啻是挑戰單軌直線並且否定青少年性主體身分的學校霸權。既然學校霸權容不下同學對戀愛與性事神秘而美麗的憧憬，青少年正常自然的好奇求知慾只能訴諸引人遐想、刺激感官享受的消費文化。與其貶斥為荼毒青少年，不如撫心承認其引證了學校與主流性教育的失敗。

從青少年角度看，閱讀三級刊物以至發生情愛性事，倒有進步積極的意義：挑戰成年人與學校霸權強加的種種關卡限制，而追尋獨立自主的（性）主體意識，擺脫「女性貞操」這種男尊女卑的封建秩序，尋求一夫一妻終身婚制以外的多種感情模式，顛覆把「性納入婚姻架構」的政治體制，批判以婚姻來衡量性愛對錯的霸權思維，以至挑戰成年人年齡主義雙重標準。

翻看性教育的教材及有關研究，眾腔一調對青少年灌輸「非性化」的指令，否定青少年享受性事的權力，否定一切發生在青少年身上的性行為，令青少年相信，那些沒有性需要、壓抑性表達、專心讀書多做運動的「非性化」同學，才是理想精進的人版典範。

如斯「非性化」的道統，正是性教育的最大諷刺。

(五) 反性論述

早在 1986 年，家計會就指出：性教育的意義，「不僅灌輸、解釋各種與性相關的知識，更重要的一面，性教育在於培養健康、良好的性態度，總而言之，推行性教育可以全面澄清流傳社會中的各種錯誤性知識與性態度。使每個男女都能充份發揮天賦與個性」（1986: 4, 6）。所言甚是，可惜落實到具體性教育教材上的內容，觸目遍是對性充滿禁忌與負面評價，關於自慰與色情的內容就是明顯例子。

到這兩三年，自慰才不再被稱作「自瀆」。「瀆」者，骯髒污染也，徹底否定了自慰的意義，等同為淫蕩與猥褻，命名本身已是道德譴責。在提及自慰的性教育教材與資料裡，即使承認它可以鬆弛及舒緩性慾念與緊張，卻必定強調「長期過於頻密而沉溺在自瀆手淫當中」（《性教育手冊》，1992: 65）所產生的罪咎、自責、恐懼、沉溺、傷害身體、萎靡等負面影響。本節開首家計會有關「性教育的意義」的《性教育小冊》裡，內文還有一節以「過度自瀆」（1996: 36）為標題。

其實，任何事物，包括讀書、打球、游水、返教會以至吃飯，「過度」均屬不佳，有不良影響。可是在文的「種種」教育素材，從來沒有人強調：不要「過度」讀書／打球／游水／返教會，唯獨是「性」，就立即表露出諸多顧慮與擔憂。同樣是教育內的「戀愛」、「約會」，討論還算開明中肯，一旦牽涉性器官，總必煞有介事如臨大敵警告青少年不可濫交、不可縱慾、不可有婚前性、不可過度自慰。

問題是，自慰有何不妥？沒有傷害第三者，根本不牽涉旁人，自負盈虧不假外求，而且是不會感染性病的安全性行為，卻因為不是婚姻制度下的性事，而備受貶斥。試想，青少年自十二、三歲已在性生理上發育完備，一般二十七、八歲才結婚，中間的十多年，一旦發生性關係，即使是兩情雙悅的，仍屬招惹閒言風語的「婚前性行為」。

這種對婚外性事的口誅筆伐，在色情論述上表露無遺。早在，1974年10月7日，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就發表一份「救救孩子」的聲明，謂：「近午來本港市面書報攤上充斥著不少極端有害的『連環圖書』，正時刻危害著我們的下一代，使他們墮落和犯罪，這些連環圖書，大部份宣揚暴力和色情，引誘兒童及青少年墮落，甚至走上犯罪道路，警方在立即引用『淫褻展覽物條例』，將所有在本港出售的上述『公仔書』加以沒收，並立即製定法案，禁止這類連環圖書出版。」

二十一年後的今天，十多個基督教團體及百多位獨立人士，聯合在《明報》（1995年3月27日）刊登「力抗歪風——黃潮下的禱文」，聲明：「創造了物的父，我們感謝你！因你所造的一切都是好，而性同樣是你聖善的安排，你就讓夫妻享受性生活，讓他們建立最親密而又神聖的關係，使性在人的尊嚴中確立。然而聖潔的主啊！這一代人卻迷失於情慾之中，甘願為性的奴僕，把性當作遊戲、交易和商品，標榜建立純肉體的關係，使人的尊嚴在性裡虧損。為此，我們求你寬恕！寬恕這在罪中墮落、陷於色慾迷情的一代。」

換言之，夫妻性愛是神聖無瑕，婚外情慾性事則屬敗壞淫亂。然而，女性主義早提醒我們，主流婚姻建制默認甚至嘉許了女男在情慾

空間與社會資源上的權力不均。大部份女子都表示丈夫不明白她的感情需要和內心感受，婚後感情質素每下愈況，性事上更不到應有尊重與平等交流。「力抗歪風」的「禱文」卻純粹以婚姻作為一切的道德準則。

1995年3月11日，各界關注色情文化聯合《救救青少年——抗衡色情文化研討會》上，發表了「中學生閱讀漫畫的情況」調查報告，發現6.5%被訪者較多看色情漫畫，看後八成產生性幻想，6.5%試過召妓。事後還與五十個團體發表「黃潮肆虐、不容忽略」聲明：「近兩年來，本港市面的書報攤上出現大量極有問題的『不良刊物』和『色情漫畫』。日前為止。估計每月發行高達二百多本，已有四成青少年曾被搜出色情漫畫。這些刊物帶有不少鼓勵性虐待、性濫交、性罪和強姦的圖文，又明目張膽地加插裸體照片……這些刊物正危害著我們這一代。在此，我們鄭重呼籲……加強管制含有色情成分的刊物。」（1995年3月27日《明報》）

古往今來，知識份子總慨歎「道德淪亡」、「人心不古」，創造社會危機的感覺，來證明自身挽狂瀾於既倒的社會價值？即使社會健康成長，道德家長仍滿腔熱誠地循例危言聳聽「色情濫泛」、「淫慾橫陳」、「救救孩子」。

上述《中學生閱讀漫畫的情況》問卷調查，並不如主辦者所言般顯示色情泛濫或道德淪亡。絕大部份（八成）被訪者較多看可愛趣緻的漫畫或動畫，看色情漫畫的只佔6.5%，佔不足十分之一，怎算嚴重？即使這6.5%中，絕大部份也表示會抑壓自己的性幻想！

性，是人類經驗的自然部份，青少年成長總會經歷性好奇與幻

想，問題是部份教師／家長對婚外性快感充滿偏見和歧視，自己可以放火而不容青少年點燈，甚至不肯承認閱讀漫畫是正當的娛樂。青少年其實好奇主動、精靈鬼怪，適量的性幻想不過是聊博一粲的課外調劑，委實是沉悶刻板扼殺個性的學校教育的安全活塞。老師不反思自身學校霸權對同學的壓制，一味封殺青少年在學較霸權以外的一切提示，又怎能服眾？把一切情慾描寫統統打成洪水猛獸般的魔鬼，成年男人卻可享受嫖妓、四處留情的道德特權，是自欺和卑鄙的雙重標準。

至於色情刊物導致性犯罪，更是蠱惑人心的陳腐偏狹。香港青年協會在 1994 年出版《青少年眼中的色情刊物》中，表示「色情漫畫既提供大量裸體、性愛圖畫或照片；同時亦鼓吹性濫交、性犯罪以及性變態，不斷向青少年發出挑逗，以及引發他們的性幻想。我們特別憂慮這些漫畫所提供的錯誤意識，包括對各種性罪行，例如性虐待、強姦和亂倫的認同。青少年正處於青春發育時期，血氣方剛，既缺乏足夠的性知識，也未能確立自己的性觀念，因此，容易受誤導。」（16 頁）

突破機構 1994 年出版《本港青少年性角色、態度、行為研究報告》裡，表示：「我們發現色情傳媒對年青人在行為上的影響十分明顯，無論是性幻想、自慰，抑或是其他的性行為，色情傳媒均成為他們行動上的一種驅力，而其中尤以男性在這方面的影響為最」（65 頁）。突破機構總幹事蔡元垂更表明：「在色情傳媒影響下，出現下列相關的行為：拍拖年齡下降，性幻想內容、自慰行為次數及與異性交往時親密行為的程度（包括婚前性行為、輪姦、婚外情，及同時與

多人發生性關係)皆有顯著影響。」(81頁)

既然色情漫畫泛濫，上述調查又證明足以荼毒青少年性行為和心理。那召妓、強姦、輪姦、性虐待「暴行」應該較前大幅增加。

現實並非如此。家計會 1995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男青少年召妓數字，以 1936 年的 16%，下降為 1991 年 11.7%，而男青少年曾經逛妓院的數字，亦從 1936 年的 28.7%，大幅下降到 1991 年 16.9%。警方的罪案數字裡，也全然沒有顯示青少年觸犯強姦、輪姦、性虐待等案例的比率，有上升的趨勢。

媒介與行為的關係千絲萬縷，中外學者上百篇博士論文與研究調查，均沒發現單軌直線的因(媒介)果(行為)關係。青少年閱讀強姦或暴力故事，就算有相應的幻想，絕不表示要訴諸強姦或暴力實際行為；相反，閱讀與幻想的過程已經舒洩了許多長久抑壓的反社會情緒，在日常生活裡反而可以繼續正襟危坐作奉公守法的君子淑女。

閱讀是很複雜的詮釋過程。同樣的文本，在不同時空、不同處境、不同受眾閱讀，可以產生千差萬別意義。某些醫學權威典籍中的性描述，對某些受眾也可以產生激烈的性反應；正如《龍虎豹》、《閣樓》中的所謂「淫褻」與「不雅」，對許多人而言，不過是沉悶乏味的千篇一律，與性興奮沾不上邊。色情不一定只有一種閱讀方法，讀者也不必把內容悉敬全收。是以「色情」是否能引起性慾。我們必須追問：那是什麼媒介？何種訊息？誰是受眾？讀者來自什麼文化、階級、性別及性取向背景？

蓄意挑逗性慾的性描述，不一定是骯髒或剝削女性。女性主義者

就生產了不少女性本位的「色情作品」，打破「女性沒有性需要，只需要愛」的神話。幫助女性建立自身獨立於父權論述的情慾語言。不少「同志色情作品」更致力挑戰男尊女卑異性愛霸權，質疑為何男性不可以與男性相愛相交，為何女性必須在白馬王子的挑逗和引導下，才有性快感？即使在男性中心異性愛當本位的《花花公子》也不乏進步元素，既戳破「同性愛者=愛滋」的神話（1987年3月），強調「要用避孕袋，不要再用曾在另一個性伴侶身上用過的性玩具，洗乾淨才可再用」（「直言」1986年8月），還指出把「同性愛」裡作「兩方玩意」的愚昧無知。露骨大膽的性描述可以精彩豐富甚具思想性及教育意義，道貌岸然的性教育教材可以充滿（中產）階級論見、（成年人）年齡主義、（男性中心）性別主義及（歧視同志）。

整個反色情論述本身就預設一套「單一化」的所謂「健康」性觀念。但何謂「健康」呢？沒有定義，也沒有內容，大概是贊成一夫一妻（vs. 多元關係）、異性愛（vs. 同性愛）、陰道交（vs. 肛交／口交）、男上女下性姿勢（vs. 女性本位性實踐）、性交為著生育（vs. 尋求快感）、性交是成年人權利（vs. 青少年詭變多端的情慾世界）。

說來諷刺，我們「誤將」近代西方白人中產階級堅守的「性觀」當作中國傳統文化，如對自由戀愛、核心家庭和一夫一妻制的絕對化，反而把一切自身不容的「性實踐」強指為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如把中國文化中史不絕書的同性性事說成是「西風東漸」，把中國傳統男性三妻四妾的多元濫交說成是西方資本主義後遺症，來壓制一切婚姻以外的性行為。

性學大學高羅倫 (Van Gulik) 在 1962 年名作《中國古代房內考》已表明：傳統中國社會裡，性行為根本不會跟罪惡或道德扯上任何道德，「性」只是大自然和諧的表象，人之大欲存焉也。

本地主流社會對傳媒中的性描繪仍然是家長式的口誅筆伐，再三要求監管與壓制。同樣是社會不接納的行為，如謀殺、行動、貪污、行騙、偷竊、販毒、毆打等，只因為不牽涉性描述，電視電台報刊雜誌便可以堂而皇之詳盡露骨大書特書而不被抨擊。此等雙重標準所反映的「反性」態度構成性教育的根本困難。又譬如，現在的電視廣告管制條例，不容衛生棉廣告提及月經、經血等字眼，這固然是父權世界對女性身體的恐懼、排斥與醜化，視作為骯髒之俗物，再結合對性事的禁忌，構成這種牢不可破的性意識。倫理性教育工作者卻引用這套觀念，振振有詞要保障無知青少年，免其受媒介刺激，只為怕惹起性幻想、性興奮。

說到底性幻想又有何不妥？青少年生活在刻板公式的學校生活，面對著沉重而非人化的考試壓力，難道連性幻想的舒氣孔也要封閉？連性幻想的人權也要被剝奪？

不要把青少年視作幼稚無知只懂把色情刊物照單全收的小羔羊。旗幟鮮明「反色情」的突破機構問卷調查也發現，73.8% 青少年被動者認為「成人」雜誌上有關性問題專欄所提供的資料很不可靠或不太可靠，只有 3.2% 的人認為「十分可靠」（1994: 44），其餘 22.9% 認為它僅是部份可靠。可見青少年絕非無知愚昧，她／他們閱讀這些刊物，不一定相信其內容，只不過視之為沉悶生活裡的調劑。

倘若大量閱覽色情刊物會帶來「性犯罪」，那麼「淫褻物品審裁

處」的女男職員、審裁員、法官豈不統統變成色情變態犯罪狂魔？倘若大量接觸性會荼毒心靈、甚至導致反社會行為，那麼已婚人士的心靈豈不是受盡荼毒，亟之反社會嗎？若媒介與行為的閱讀那麼簡單，為何三、四歲的小孩子看卡通片，也不會學習心儀的主角從十八樓跳下來享受自由馳騁的魔法？倘若連三、四歲的小孩子也有基本的思考與自主，成年人何苦千方百計監管操控十六、七歲的青年呢？即使沒有色情刊物。人們一樣自慰、召妓、甚至強姦，請不要把複雜的社會文化問題找個簡單的代罪者塞責。

（六）愛滋道德恐慌

1992年1月，家計會出版了《性教育家長手冊》等二版，「是為了協助家長介紹子女施行性教育而出版的」（1992: 2）。在新增的四篇附錄表，提及愛滋病的傳染途徑，答案是：「與許多同性戀或雙性戀的男士性交」（1992: 103）。

這是個令人震驚答案。難道與女士性交，就不會感染愛滋？難道異性愛者與愛滋絕緣嗎？為什麼要歧視同性戀或異性戀男士呢？那麼基本的常識怎可能弄錯呢？難怪提起愛滋，不少市民仍然聯想到男同性戀者。家計會也這樣教導我們嘛！連衛生署在1995年編制的愛滋小冊子《為了明天》，愛滋病患者的唯一個案分享，便是男同性戀者（11頁）。而香港愛滋病顧問委員會在1994年出版的《香港防治愛滋病策略》中竟仍出現「高危人士」（9頁）這歧視用語。這個由港督親自委任的委員會出版家竟只「針對高危行為人士的政策」做標題（9頁），不禁令人懷疑這些官方愛滋委員會本身的愛滋意識，究竟

有多少？

愚昧無知的偏見，經主流傳媒與官方渠道傳播，便成為坊間的「常識」，甚至「客觀真相」。教育署在 1991 年的《性態度與價值觀》裡提到「易感染愛滋病的人士」，除了針筒吸毒者、血液感染和母嬰傳播外，使是「與患者有性接觸的女性」和「有許多性伴侶的同性戀或雙性戀人士」（1991: 3, 2）。前者顯然假設患者是男士，否則這裡的「女性」大概被說成是「女同志」吧；後者則偏見地把愛滋與同性愛人雙性愛劃上等號。女性感染愛滋的數字與比例直線上升，大抵與「患者都是男士」的偏見有關。至於性取向方面，本地愛滋病遭受感染者中，異性愛者遠多於同性愛或雙性愛，累積至 1995 年 9 月的數字，分別為 267 人（異性愛）、167 人（同性愛）及 41 人（雙性愛）。教育署這份給予性教育工作者（尤其是負責性教育的教師）的教學指引錯謬百出，無疑叫異性愛者以為：「愛滋與我無關，只是基佬病（同性戀的病）。」

教育署同一份指引裡列舉了「性病的起因及蔓延」的七個社會因素，其中一個竟然是「同性戀行為」（3.17）。編寫的人歧視同志，有關當局又不認為有問題，於是得以順利出版。在「有關性病的資料」（資料單張 3j）裡，提到「怎樣可以預防性病？」答案有五個，頭兩個分別寫「避免性交」和「只有一個性伴侶」。這份指引開宗明義謂「性教育的目的」是：「建立健康、開明而又負責的性態度」（資料單張 1c），如今竟建議「避免性交」作為預防病的一種方法，其消極、被動的「反性」立場，實令人啼笑皆非。

至於「只有一個性伴侶」，便可以「預防性病」，之後還說「對

配偶專一可防上感染傳播性病」（1991：作業 3.32），這是主流媒體和政府宣傳的一貫謬誤。在教育署出版的《愛滋病知多少？》（1990）裡，在「預防愛滋病」一章裡提到「不要性濫交」（1990：35）。教育署 1993 年出版的《認識愛滋病》亦強調「堅拒隨便的性關係」（93：34）。問題是，愛滋傳播的關鍵不在於性伴侶的數目，而是安全性事的實踐。譬如說一女子一生只會與丈夫有性伴侶，倘若丈夫以後因為血液或性事而受感染，那這女子受感染的機會就相當的高。相反，筆者認識一位男同志，曾經與上千位陌生男人百性接觸，是絕頂「濫交」吧，但他從未試過肛交，通常是互相用手自慰，是危險性極低的性行為，故多番驗血，結果也是呈陰性反應。

越來越多愛滋個案顯示太太被丈夫傳染。大家受這些官方教育，以為只有一個性伴侶，就可以預防愛滋等性病。君不見婚姻指南手冊絕口不提性病及安全性事，彷彿結婚便可預防愛滋。衛生署在 1991 年派發的《性病：可以嚴重損害健康、應當及早徹底治癒》單張指出，預防愛滋及其他性病「最有效的方法」，竟然是「不要作婚外性行為」！因而把醫學與安全性事的問題，變成道德論述，彷彿愛滋病毒是有意識、有計劃地挑選有婚前、婚外性事的人上來襲擊似的，即使我以往有數百次不安全的性行為，只要我婚後專一，就可免疫於愛滋。整個愛滋教育的論述不斷複製一種奇特的二元對立：一對一異性愛婚姻內的性，便是安全性事，異性愛婚姻外的性事不但是婚前、婚後、同性情愛、多元關係，也不論性事如何自然、互動、平等、安全，通通被視為愛滋病的成因之一。愛滋教育變成不折不扣的異性愛婚姻教育。

筆者翻看教育署、衛生署、家計會及其他自願機構有關預防愛滋的印刷品，大多含糊其詞說避免濫交，卻沒有一份明言「一次不安全的性接觸就可能感染愛滋病毒」，沒有說明「什麼是不安全的性接觸」，從不具體講述「安全的性接觸」，不會講述「安全套的正確使用法」，不會提到陰道、陽具、勃起、射精，更不會展示安全套與性器官的真實圖片，以免「教壞」市民（安全的性「是壞事嗎？」）。

此等充滿忌諱的態度，才是最需要教育的性教育。

小結

家計會在 1991 年的調查發現。在學青少年性知識不但沒有隨著性教育的普及而大幅提昇，比較 1986 年調查，竟是每下愈況的倒退。在「月經前兩週性交而引致懷孕機會並不高」的問題上，超過半數被訪者表示「不知道」，能回答正確回答的只有 27.8%，比 1986 年的 38.3% 下降許多。在「與首次發生關係的女子性交，不可能導致懷孕」的問題上，竟有三成被訪者說「不知道」，正確回答的被訪者只有 65.8%，不比 1986 年時多。在「女子若無性高潮，性交不會懷孕」的問題上，如此基本的性知識也有 46.2% 說不知道，答對的只有 50.4%。比 1986 年的 68.8% 下降許多。而且，竟然只有 20.8% 被訪者知道陰道外射精，也有可能引致女伴懷孕，比 1986 年的 30.7% 下降了一成。

經過十多年性教育，青少年的性知識仍如斯貧乏，錯謬百出，不禁令人反思：我們的性教育，是否出了毛病？是否能針對青少年的真實需要？是否與現實脫節？

下述例子，或許稍露端倪：家計會在《性教育行動》（1992）中說，若你是中學班的班主任，「那天的講題是異性交友、戀愛與結婚，十六歲的阿珍站起來向你發問，性交時用安全套會不會影響感覺」，應如何回應呢？家計會給予這位負責性教育的老師五個選擇，教師「可自行決定選取」（46 頁）：

「（1）請阿珍坐下，告訴她這個問題離開了今天的主題，你會留待將來討論到有關題材才作答，你便隨即繼續你的講題。

（2）告訴全班這個問題不適宜在這個年紀去了解，並且趁機會教導他們現在應專心讀書，不宜談戀愛，更不應想到性行為這件事，這些事留待年紀大了便自會明白。

（3）微笑搔頭，不發一言，示意阿珍坐下，顧左右而言他，盡快切入原有的主題。

（4）……」（48 頁）

不同的調查告訴我們，現在青少年首次拍拖年齡的中位數只有十三歲左右，越來越多青少年提早有性關係，主流性教育卻令青少年對婚前性行為有犯罪感，故不會預早教導避孕安排，到偶發地發生性行為時，便抱著試試運氣的心態。換言之，事前不去想，事後也不會向代表著成年人霸權家長／教師／校長求輔助。萬一懷孕，也可能到深圳墮胎了事，既危險、不安全，復再平添當事人的罪咎、不安與自責。

婚前性行為既是老生常談，青少年的性知識又如斯貧乏，在性教育課堂上談論安全性事與避孕，本是對症下藥的當務之急，偏偏本地

性教育教材裡沒有一份提到避孕的方法或安全套的功能與使用。許多少女少男經常發生性事，卻從不知如何使用安全套。一個十六歲的少女，冒著被訕笑、懷疑為性濫交之險，仍勇敢地在課堂上提問安全套的使用，家計會竟認為教師可以「微笑搔頭，不發一言，示意阿珍坐下，顧左右而言他，盡快地切入原有的主題」，還說「這個年紀不宜了解安全套的問題」。這不單嚴重打擊阿珍的自尊自信，也叫同學不要去面對、思考安全性事的問題，同學倒唯有依賴運氣，或道聽途說八卦周刊式的性知識，到頭來懷孕、感染性病，責任由誰來負呢？

日前仍有許多中學在生物課堂上講述一些「人體成長的生理變化」，便以為是「性教育」；把「性」歸化為性器官，把「性教育」還原為枯燥乏味人體解剖與性器生物科。同學除了接觸到一大堆難澀抽象的生物名詞外，什麼也沒學到。

倘若我們不正本清源，反求諸正面面對既有的性教育，叫家長、教師、社工、媒介工作者等人首先受教育，那只會催逼青少年從坊間扭曲的性商品市場裡，在毫無指引下隨意狩獵一些似是而非的資訊。

教育文字教材

《性態度與價值觀——教材套甲
、丙、乙、丁》	教育署輔導視覺處社會及健康教育
組及中學社會教育科課程發展小	1990
《性病常識不可不知》	衛生處中央健康教育組	1991
《青少年與性》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1991

《性與傳研討會報告》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1991
《性教育家長手冊》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1992
《性教育行動綱領（上、下篇）》		
《性教育小冊》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1986
《邁向美滿婚姻》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1994
《性與婚姻研討會報告》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1991
《漫步婚姻路》	港明愛家庭生活教育統籌委員會	1993
《婚外情問題研究報告書》	香港明愛家庭服務	1995
《青少年眼中的色情物品》	香港青年協會	1995
《青少年對拍拖的觀感》	香港青年協會	1995
《少女懷孕現象》	香港青年協會	1995
《本港青少年性角色、態度、行突破機構為研究部告》		1994